

实现人口转型, 推动西部开发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Typ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穆光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

北京 100872)

一、西部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传统型人口的压力

开发西部, 建设西部,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西部地区是指我国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 10 个省、区、市, 面积 545.1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 56.8%, 堪称“半壁江山”。截止 1998 年底, 人口 2.85 亿, 占全国人口的 22.8%, 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 14.55%。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 有 50 多个少数民族居住, 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80%, 东西部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距。西部目前有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307 个, 占全国总数的 50% 以上。西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荒芜、贫困、落后和封闭。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人口方面也需要有所考虑。西部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传统型人口的压力。农业人口、贫困人口、低文化素质人口比重过大, 落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及狭窄的视界和短期行为的交互作用, 导致了反生态、恶知识和远市场的结果。

在人口方面, 西部给人的印象是人口增长快、人口素质低、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事实也是如此。其中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西部的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15 岁及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譬如, 1998 年的西藏还有近 60% 的成年人口是文盲半文盲, 青海也高达 43%, 贵州、甘肃均接近 30%, 云南、宁夏也有 1/4 的人口是文盲半文盲。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 西部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人口占在业人口数比重的 39.5%,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 个百分点, 高出东部地区 11 个百分点。西部 90 年代在业人口受教育年限仅相当于东部 80 年代水平。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和由此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等问题, 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开发的主

要制约因素。

西部的优势主要是自然资源或者说主要是矿产资源, 而其它方面, 如体制环境、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教育科技和人口素质等均表现出很明显的弱势。例如,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大省, 柴达木盆地蕴藏着丰富的氯化钾、氯化钠、氯化镁、锂、硼砂等矿产资源, 而青海依托黄河上游充足的水电, 为开发上述矿产品、深加工具有高附加值的国内外抢手的下游产品提供了基础条件; 青海冷凉的气候, 适合种植优质土豆、油菜等农产品; 青海还出产数千种中藏药药材, 虽然其产品在国内十分抢手和畅销, 但由于科技水平低, 一直没有形成优势产业。

仔细研究的话, 西部的资源优势是相对的, 譬如水资源方面就没有太多的优势, 相反地,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水还是一个制约性的生态因子。目前全国牧区近一半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没有解决, 1/3 可利用草场是无水草场或者供水不足草场, 牧区饲草基地和天然草场灌溉面积仅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0.35%。由于缺水, 草场荒漠化面积已经达到 73 万 km^2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牧区水利建设长期严重滞后。在西北地区, 干旱与沙化现象特别明显, 水资源尤为缺乏, 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影响很大。近几年的研究表明, 西北一带水生态的失衡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非常状态。且不说母亲河断流的源头就在西部, 各类湖泊干涸萎缩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如, 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 30% 以上的湖泊已经干化成盐湖, 累计亏水量 148 亿 m^3 ; 新疆全区湖泊面积比建国初期减少了 4 952 km^2 ; 冰川是宝贵的淡水资源, 但现在冰雪覆盖面积的缩小、冰川退缩速度的加快已经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之一。与冰川息息相关的内陆河流量也受到影。著名的塔里木河, 在尉犁县以下已成永久性断流, 由于两岸植被退化、沙化, 水量减少, 干流实际长度已经从 1 272 km 缩短为 987 km 。过去被认为地下水富裕的榆林地区, 近年也发现地下水每年以 0.5~1 m 的速度下降, 最多的为每年 3 m 。类似的情

形绝非个别。可想而知,没有水资源的依托,就谈不上起码的人口养育力和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与自然资源不能很好地加以匹配,结果“守着金山当穷汉”,一方面资源沉睡,另一方面人口受穷,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时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富饶的贫困”现象;二是在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下,众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导致恶性循环。众所周知,西部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对人口的养育力相对有限。明清以降,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戍边,造成人口急剧增加,强烈冲击着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建国50年来,西部人口空前增加,人类活动更加频繁,过度垦殖、过度樵采、过度放牧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反生态的行为使得西北广大干旱地域仅有的一些绿洲的外围和边缘地区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且危及到了整个绿洲的可持续发展。西部目前一个较大的问题是生活能源的缺乏。根据陕西省部分县的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尚有41%的农民缺柴烧,农民所烧木材大多来自山林,结果是生态建设赶不上生态破坏,生态赤字逐年累积。在很多贫困山区,不少缺乏能源的农村人口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挥斧向树、挥锄向草,结果伴随人口增长压力而来的生存需求问题成了西部生态恶化的契机。如,宁夏南部山区,由于农民大量铲草皮作为燃料,加剧了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的年平均土壤侵蚀系数高达7 000 t/km²,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

人口过快增长和人口素质偏低的交互作用,贫困和愚昧的交互影响,使得人口、资源、环境的不良循环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被突破和摆脱。所以,虽然西部的地理面积占到全国的56.3%,但真正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并不太多,目前的情形依然如此。西北地区虽然总的来说人口密度较低,但由于人口大多居住在关中平原、黄土高原的台地和极少数沙漠绿洲,所以相对人口密度仍然较大。比如,青海的人口显著集中于西宁一带地区的河湟流域,而宁夏的人口则主要集居在以银川为重心的“千里黄河、独富一套”的河套地区。所以,完全可以说西北地区恰是“地广而患其狭,人少却患其多”。

二、亲生态、亲知识、亲市场: 西部人口转型的战略指向

西部大开发的主题实际上是人口与资源环境要素前所未有的一次大组合、大调配。但这样的组合和调配是一定要在“亲生态、亲知识、亲市场”的文化理念下来加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架构中实现人口类型的现代化。

“大开发”首先需要的是“大建设”、“大改革”和

“大开放”,最终要实现的是“大发展”。大开发是西部发展的主题,但不能仅仅将西部的开发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首先,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里实现人力资源的总动员。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把着眼点从过去的“物的开发”转到重视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方面的“人的开发”上。其次,大开发必须要时刻同大保护和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必须同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总的来讲,我们需要培育新经济文化下的人口类型,这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市场的现代人口类型。而现实情况是反生态、恶知识、远市场的人口还比较多。我们要完成历史性的人口转型的工作,也只有这样的转型才真正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西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处理不好,大开发可能导致大破坏和大倒退(特指生态环境方面)。西部的人口压力主要来自传统型的人口比重过高,而人口的生态素质和市场观念又相对滞后。传统型的人口一般与自然资源发生直接的联系,与种植业、牧业、林业关系密切。他们对自然资源多采取掠夺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以贵州为例,面积17万km²多,人口却有3 600多万,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人们为了找饭吃,就不得不向缓坡、陡坡开垦耕地,以致25度以上的坡耕地达到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0%。这种紧张的人地关系造成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在全省86个县市中有64个县处长江上游,35个县处珠江上游。每年流入长江和珠江的泥沙高达6 100多万t,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省份。水土流失导致许多地方土地肥力下降、石化面积扩大、塘库淤积、水利工程效益降低、山洪和泥石流发生的频率逐年上升。生态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环境,结果环境的养育力下降,人口的承载量减少。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这里,可以有两种发展取向:一是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这就需要改良土壤、品种等农业科技的创新;二是虽然人口在增长,但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需求并不是直接向大自然施加压力,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市化、非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就业的分化和阶层的分化。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扩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也就丰富了起来。所以层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拓展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减少增长的人口对于资源环境产生直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好像分洪一样,在人口增长浪潮的压力下,需要开辟新的通道。问题恰恰在于,由于社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乏力,所以“人口发展空间”过于狭小,结果是拉紧了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依据是在非农产业领域就业的西部农村劳动力比重偏

低。根据有关研究,1995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3%。

如此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实现人口增长的转变,同时也要积极地推进人口类型的转变,就是要设法使人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改变,这是可持续发展要求下人口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果在大开发的过程中人们还是在传统的垦殖农业、粗放经济的模式下生产和生活,就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的越来越多的掠夺和破坏的结果。“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成了尽人皆知的怪圈。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全国有大于25度陡坡耕地9100万亩,其中只有不足18%改造成了梯田。由于长期不合理耕作和过度开垦,上述坡耕地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了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水土流失严重。根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四川、重庆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量在6亿t左右,约占长江上游每年输入长江泥沙量的60%;陕西省陕北丘陵沟壑区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达8亿t,占三门峡以上地区输沙量的一半。水土流失不仅造成江河下游河道淤积,留下洪灾隐患,而且引起当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比如,仅贵州省每年就因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亿元。今后十年,我国将停止耕种5000多万亩坡耕地,使其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平衡。但与此同时却要解决依赖这些土地为生的4000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坡耕地关联着大量落后地区农村人口的生活出路问题。根据典型调查测算,仅贵州、陕西、重庆、四川,就有1100多万人把陡坡耕地的收成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其中近200万人的基本口粮完全依赖于此。显然,为了偿还长期的生态赤字,反贫困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贫困不仅是最大的污染,而且是最大的破坏。基于这种论点,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调整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施“反贫困”战略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重点之一。进一步地,笔者认为,必须超越传统的人口统计学视野,在人口转变理论之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人口转型理论。

“人口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人口的就业类型、人口的阶层类型、人口的特征类型(重要的有:是亲生态还是反生态?是亲知识还是恶知识?是亲市场还是远市场?)。层化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目的就是要阻断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关系,拓展“人口发展的空间”和“人口发展的水平”,实现人口转型。这除了前述的首要的“人的开发”外,还需要从以下3方面努力。

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推动人口离土离乡,拓宽资源利用和人口就业的空间。“超薄型低层次平面垦殖的农耕方式”是人增一地减一粮

紧的要害所在。这种落后的、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空间狭小、集约程度很低,其本质特征是人口与资源关系的狭隘化。越来越多的人口堆积在有限的而且是肥力递减的耕地上,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主要就表现为人口与土地(耕地)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平面的、线性的关系,同时资源的开发也是低度和低效的。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是这种落后农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1987年,笔者在宁夏泾源县调查时就得知,土层很薄、漏水漏肥、难以深耕的山旱地就占了耕地总面积的77.3%,越来越多的人口对于脆弱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由此可见。通过输出人力来开发人力和缓解西部的人口压力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已有这样的总结:“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十家,脱贫一村”。现在的一个关键是要培育生产要素分离一组合的机制,在主导产业生态化、市场化、高科技化的前提下,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单一的产业结构中转移出去,实现生产要素更为有效的组合。

其二,“环境移民”也是层化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环境移民”总的原则是“人口的消费力和环境的养育力要相互平衡”。三峡移民和神农架移民已经给出了榜样。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库区各级政府1991年至1992年的调查,三峡库区淹没涉及重庆市、湖北省的20个县区、277个乡镇、1680个村,将有2座城市、10座县城、1599家工矿企业全部或者部分被淹,淹没线下人口84.75万人,规划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前需要搬迁安置约113万人。到1999年底,重庆市已经搬迁移民19万人,人多地少,土地人口容量不足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根据当地测算,通过开垦荒地、坡地改梯田、调整责任田、工程防护等多种措施,可以扩充的土地人口容量依然不能满足原规划的安置农村移民40多万人的需要。基于三峡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如果强求就近安置,只能加剧毁林开荒、陡坡种植,造成长江流域新的水土流失,形成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洪水泛滥,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子孙后代。正是出于这样深层次的考虑,中央及时调整了三峡移民政策,拟将重庆库区的7万农村移民外迁到上海、江苏等11个省市落户,其中迁到上海的约有5500名。与此同时,同样是出于保护生态的目的,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点的鄂西北神农架已经有1700多户、5000多名村民在政府的组织下自愿迁出保护区,将家园让给不断增加的野生动植物。这种积极有效的生态移民做法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作出了贡献。

其三,城市化是使人口相对集中,提高人口规模效益的基本的和重要的途径,应当在现有的财力下尽力抓好西部中小城市的开发和建设。

(责任编辑 孙立明)